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我国社会资源配置评价 与社会分层关系研究

王申贺 著

Wang Shenhe Zhusun
Pishi Pingjia
yu Shehui Fenceng Guanxi Yanjiu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我国社会资源配置评价与社会 分层关系研究

王申贺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社会资源配置评价与社会分层关系研究/王申
贺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607-6225-8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资源配置—影响—社会
阶层—研究—中国 IV. ①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2774 号

责任编辑: 张 瑞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3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0.5 印张 15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提高社会流动性,激活和释放社会发展活力	(2)
二、向社会改革寻求“改革红利”,助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11)
第一章 社会资源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应用	(16)
一、社会资源的概念及理解	(17)
二、社会资源配置的价值分析	(21)
第二章 社会资源配置变革引发社会结构深层变动	(26)
一、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社会流动机会	(27)
二、社会资源分布序列差异下的社会分化	(28)
三、“帕累托改进”边际效应不断减退	(35)
四、富豪移民引发社会财富安全的担忧	(42)
五、社会资源配置不公与财富分配格局失衡的隐忧	(47)
六、社会分化下的社会结构内卷化	(49)

第三章 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导致社会结构固化 (56)

 一、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例偏低影响社会流动 (57)

 二、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将削弱社会自我创新的动力..... (73)

 三、社会资源配置不均衡抬升民生成本 (83)

 四、社会保障需要体现公平性,民生改善呼唤制度支撑 (92)

 五、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中下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101)

第四章 建立新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113)

 一、关于社会资源配置理念的探讨 (113)

 二、改革社会资源配置的对策与建议 (122)

主要参考文献..... (147)

后 记 (162)

绪 论

2018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一年的统计指标:2017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8271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稳居世界第二;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9660 元,比上年增长 6.3%;全年国民总收入 8250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的标准^①及以可比数据测算,我国均 GNI 从 3000 美元增长到 9000 美元期间,就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了。2012 年 11 月 28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也提到,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提及中等收入国家也许会使人联想到另外一种经济社会现象——“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范围来看,能够依靠自身改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多。自 1950 年以来,在全球超过 100 万人口的国家 and 地区中,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②、沙特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跃升到高收入行列。而更多的国家,如阿根廷、墨

① 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类,分类标准则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如 2010 年,低收入经济体人均 GNI 为 1005 美元或以下者,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 GNI 为 1006~3975 美元,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 GNI 为 3976~12275 美元,高收入经济体人均 GNI 为 12276 美元或以上者。当年中国人均 GNI 为 4260 美元,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 121 位,居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② 指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西哥、巴西、智利等在 20 世纪末就已步入中等发展阶段,但这几十年来一直因各种原因滞留在中等发展阶段,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无力自拔。自我国迈进中等收入的门槛以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从战略层面做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准备。因为这惊险的一跃关乎我国的未来走向及现代化的进程。

一、提高社会流动性,激活和释放社会发展活力

根据近 50 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分析,大多数国家能够通过发展经济完成脱贫,跨越“贫困陷阱”。处在脱贫阶段的国家有很多优势,如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连环境保护要求低、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换发展也成了优势,诸多优势累加有助于国家在一个低成本的平台与其他国家竞争,以低成本优势摆脱贫困。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最先丧失的就是低工资、低物价基础上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等收入国家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在低收入阶段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战略将失去效力。”^①资源和环境的优势也会逐渐耗尽,再加上国际市场初级产品的销路越来越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产业升级,这时需要的是高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竞争对手也换成了比自己强大的发达国家了。

从社会层面来看,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民众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

^① World Bank,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8.

社会各阶层很容易在社会发展目标上达成共识。在社会发展之初,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强,个体的发展起点差距小,上升空间也比较宽广。个人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从一个阶层转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保持着很高的速率,从而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厉以宁曾研究指出,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进程中,以社会身份变化为核心的社会流动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一个社会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的重要环节……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流动性。”^①社会流动可以使不同阶层的成员相互交往、彼此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误解和偏见,缓和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和冲突。据黄仁宇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主要存在两个阶层,即士绅阶层和农民阶层,连接这两个阶层的纽带就是科举考试,“一个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②。科举考试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在阶层交换中保持大致的稳定,正是这样特殊的流动通道使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超过了2000多年。^③对于社会结构来说,合理的社会流动是社会机制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部分,对社会结构的整合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反之,一些国家的经济停滞和衰退与社会阶层固化密切相关。蔡洪滨认为,“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正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④,一个国家只要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经济长期增长就有基本的保证。因此,“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性,而最重要的渠道就是要保障所有人都能够公平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⑤。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的发展来看,社会流动至少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积极

①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48页。

②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2~193页。

③ 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92~193页。

④ 叶帆整理:《收入差距扩大严重拖累经济发展》,2013年6月9日《人民日报》。

⑤ 蔡洪滨:《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流动性》,《比较》2011年第2期。

作用:

第一,有效地改变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激发所有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在封闭的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赖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因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传统社会就是以关系来规定人的身份、地位的,人通过‘血缘关系’——这一社会资本可以获得低位、声望。”^①成员个体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以改变社会位置,社会背景成为推进社会流动的第一因素,这严重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造成整个社会结构更替机制的停滞和固化。社会流动为各阶层成员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机会,无论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家庭,大致上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即所谓“起点公平”,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原有的社会关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社会成员来说,这种改变意味着社会对自身价值和努力的肯定。通过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成员又为自己进一步再向上流动创造条件。努力向上流动的社会成员能使其他人群产生自然的应激反应,促使其更加警醒、发愤、调整、效仿和超越。“社会分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社会成员的‘激励’作用”^②,通过社会流动改变不正常的社会生态结构,激发出社会更大的发展活力。

第二,帮助建立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社会流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帮助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社会成员建立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关系与平均主义宣扬的所有社会成员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不一样,它强调的是发展机会上的平等,也就是起点公平,即所有具备一定天赋和才华的社会成员不分血缘

① 卜长莉:《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② 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和地缘,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竞争,以此获得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比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平台。这意味着阶层之间的隔膜可以被打破,从而在社会制度上剥离社会地位与出身、职业之间的关联。社会的流动性越充裕,社会结构就越开放,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就会趋于平等,社会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第三,促进社会分层体系的优化,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体系在不发生基本结构变化的情况下,主要借助社会流动调适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如城乡人口流动、职业间人口变动等属于横向的社会结构调整;如果社会流动发生在不同位序的阶层之间,就会形成社会结构的纵向流动,亦称“垂直流动”。一些阶层的人数增加,而另一些阶层的人数减少,就形成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避免了阶层发展中自我复制、代际传递现象的发生。如何创造有效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社会流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现代社会结构整合的一大难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化的加速都会使社会保持合理的人员流动,以使社会结构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面临冰火两重天的命运:有的一路高歌,继续在复兴之路上大步前进,踏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更多的是不可阻挡地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这判若云泥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很多经济学家对身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所作的探索基本是正确的,并未出现大的纰漏。不过,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方面。陆学艺认为,国家建立的“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要实现经济

现代化,而且必须实现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①。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演进,除经济发展之外,还有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环境发展等多个方面,这些国家初期的经济增长强势恰恰掩盖了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问题,也掩盖了政治、法律、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展滞后的问题。经济再重要也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面,仅靠经济上的单兵突进,不能助推整个社会完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惊险一跃。

纵观滞留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没有搞清楚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哪里,只是单纯地追求速度增长和规模扩张,忽视了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通过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保持各阶层之间和谐的利益关系。康德曾说“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②,而掉入陷阱的国家就是颠倒了这个基本关系,把少数人的需求当成全社会的目标,尤其是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没有秉承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导致在社会财富的占有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不会忽略它的作用。”^③上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忽视了公平公正的基本准则,社会问题才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致于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发展中,缺失公平公正的国家终生祸端。孔子在 2000 多年前就已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④这是孔子的国家财富分配观,其根本原则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讲的“均”就是公平。孔子认为,若一个国家在财富分配

① 陆学艺:《社会建设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 页。

② [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 页。

③ 徐月宾、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载徐月宾主编:《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01 页。

④ 《论语·子路》。

中未坚持公平的原则,肯定会造成贫富差距太大而引起社会动荡;相反,按照公平原则分配社会财富的国家则能够消灭贫困,即“均无贫”。2000多年过去了,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启动或者复苏后,没有遵从公平公正的理念及时调整社会政策,结果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整个社会深陷动荡不安的局面,甚至有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反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出现社会动乱,成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①这些教训对于刚刚步入中等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极具警示意义。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报告:危机10年后的状况》报告中分析了为什么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中等发展阶段的问题,并提出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所必需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变化,在技术、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更复杂、更具挑战性”^②。从人类文明进步史来看,良性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难度要远远高于物质产品的再生产难度。在经济改革方面,政府只需政策引导,社会成员就会去努力赚钱,大家赚到钱,国家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政府除了增加税收之外,没有任何经济上的付出和损失。但社会改革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因为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势必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并陷入了贫困状态,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政府需要出钱或者从高收入社会阶层那里收税来帮助这部分社会成员。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推行社会改革,难度都是非常大的。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发展前期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协调,社会变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而严

① 叶帆整理:《收入差距扩大严重拖累经济发展》,2013年6月9日《人民日报》。

② World Bank, “10 Years After the Crisis”, in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Updated*, The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April 2007, p. 3.

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大多是社会管理制度落后、缺少主流文化且文化总体落后,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实现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导致社会利益分配失衡,社会中少数利益集团占据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果实,出现了“经济增长,社会劣化”的二律背反局面。社会劣化的基本标志就是由社会流动性迟滞导致的社会结构固化板结,即占尽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上层和没有上升空间、少有发展机会的下层都出现了明显的代际传递。面对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城市失业率不断上升以及贫困人口的不不断增加,社会各阶层在未来发展目标上丧失了共识,整个国家处于“一个断裂的社会”^①中,主要表现为: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积累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另外,一些国家如阿根廷、秘鲁等还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日本、韩国和“亚洲四小龙”,其中日本和韩国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已经完成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② 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日本和韩国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且跨越进程并不漫长,“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③。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它们基本转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管理方式创新、生态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但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所有进入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会无一例外地遇到分配不公等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问题,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日本和韩国在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后,或先

① 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②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方焯、王璐:《专家称改革受利益集团羁绊,致国家陷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8月8日《经济参考报》)

③ 方焯、王璐:《专家称改革受利益集团羁绊,致国家陷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8月8日《经济参考报》。

或后地推出了各种缓和贫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并根据本国国情不断加以完善。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韩国主要是推出了一系列与中等收入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均等化”政策,如改善城乡差别,开展“新村运动”;重视教育发展,推进教育均等化,并以此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出台政策,缩小收入差距,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金大中在任总统期间强力打压财阀,通过改革、重组打破垄断,加强对富人收入的税务征管,对不动产征税,打击不动产投机。另外,为应对民智的开启、公民政治权利的扩大和民主意识的提高,韩国力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政治经济改革,通过国家税收政策,增加农民和工人的实际收入,避免了财富差距两极化的出现;重视并加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1950年,韩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仅为2%,1984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高达14%,目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保持在7%左右”^①。同时,政府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促进就业,增加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消灭绝对贫困;推行全民医疗保险、最低工资、国民年金等制度,解除国民后顾之忧。通过一系列“共享发展成果”政策的推动,韩国消弭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膜和裂痕,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建设的同步发展,把一个曾经腐败成风、“黑金”泛滥、贫弱不堪的韩国带进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日本也是因为有效地控制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依靠分权和制衡来抑制社会单极化的生成,确保了全社会利益的基本均衡,使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20%最穷人群收入与最富有人群收入比值差异最小的国家。

^① 樊继达:《韩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7月25日《学习时报》。

改革开放之初相对充裕的社会流动性,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社会原因。社会成员都在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的历史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开辟了一个蓬勃向上的新时代。但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流动的亢奋与和谐悄然而止,最近十几年的多种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社会流动性不断下降,这与经济增长减速也是同步的。随着可分配的社会资源越来越稀缺,阶层间利益博弈趋于刚性,社会再分配的难度激增,阶层间的利益关系也变得严峻起来。国家投入到医疗保障、教育发展、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巨额资金,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高收费的浪潮中被吞没。社会精英阶层则利用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垄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形成了非常稳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中下层越来越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资源,以抵御市场经济下的巨大生存压力和风险,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产业化将大众的生活成本迅速推高,失去了社会流动活力的社会中下层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被甩到了社会结构的边缘。

各阶层之间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边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等强势阶层的代际传递性明显增强,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的阶层,已经没有能力上的从容和国家层面政策上的支撑,面临的阶层上升门槛明显抬高,社会流动障碍越来越多。社会中下阶层非常明确地感到来自精英群体的排斥,蔚成风气的“二代”现象成为代际传递、社会固化问题的最好注脚。

二、向社会改革寻求“改革红利”， 助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长期以来，向上流动是大众生存与发展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即使在社会底层，在生活陷入困顿之际，向上流动的希望之火依然能够点亮贫困者的人生梦想。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制度、政府政策、价值观念不能继续保持对社会流动合理机制和规则的支持，但优势阶层会利用各种机会将自己优势进一步扩大、定型，通过阻断社会流动来减少竞争对手，从而导致其他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规则还在完善之中，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与政府行政管理之间仍在博弈，行政管理、政府垄断深深影响着市场作用的发挥，这导致部分管理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缺陷谋求利益，尤其是利用行政权力侵蚀市场机会，这些率先获得社会资源的人成为先富者。同时，在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没能扮演好一个中立的调停人的角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流动机制的确立和完善。

政府权力越位、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保障层次低等问题，与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密切相关。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通过社会利益再平衡机制维系合理、公正、顺畅的社会流动。只有流动起来的社会，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基础保障，才能为每个公民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现实基础。我国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后，很多人就不自觉地和“美国梦”互相比较。严格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蕴含着明确的集体主义价值诉求；而“美国梦”则明确以个人主义诉求为价值导向。“中国梦”不单纯以增强国家实力为价值追求。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①“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②，可以说“中国梦”悦纳了人民群众中个体的理想之梦，“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③。国家、民族、社会、家庭、个人的共同发展，才可以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进而铸就民族和国家的强盛。

社会流动性的下降给未来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社会保持充裕的流动性意味着阶层差距、贫富差距及其内含的不平等只是动态的，可以被消除；相反，则可能变成静态的，各种社会不平等有被固化的危险，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实，无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它们得以存在和实现的前提就是社会要有充分的流动性。在一个暮气沉沉的社会，社会下层是没有正常上升机会的。社会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理顺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不好，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就会从底层反映出来。我们必须从制度、体制和政策层面入手，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推动社会资源配置改革，来均衡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重新为社会流动注入活力。

第一，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必须依靠法律制度。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的基本标识，就是严格规范公共权力基础上的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平等化。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也只能依靠法治才能做到。社会公平仅靠提倡无法达成，任何公平的设计必须有法律的保驾护航才能得以实现。市场经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地使

①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② 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③ 2014年6月6日，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讲话。